



# 科学思维的魅力

## ——《娜拉走后怎样》何以成为经典刍析

杨益斌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湖南省益阳市)

摘要：《娜拉走后怎样》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中的经典性文献”，归根结底还在于其远胜时人、遥遥领先于同侪的科学思维。从思维的独到性、深刻性，到思维的超前性和两面神性，足以显示鲁迅见人识事、揆情析理的先人一步、高人一筹、深人一层。这与他学贯中西，而且早年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熏陶所养成的较宽知识视野和较强现代思维密不可分。

关键词：鲁迅；娜拉；思维；独到性；深刻性；超前性；两面神性

《娜拉走后怎样》<sup>[1]</sup>是鲁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发表的公开演讲的记录修订稿，也是现存鲁迅自己认可的演讲文稿中最早的一篇。这篇演讲辞，经历时光的淘洗脱颖而出、卓尔不群，早已成为“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中的经典性文献”。<sup>[2]</sup>它何以成为经典，可以从思想、文学、写作、演讲等不同视角观察。

在中国现代史上，鲁迅不仅奉献了他人无可替代的创作“实绩”和“民族魂”精神，而且为改善民族思维质量作出了重大贡献。<sup>[3]</sup>《娜拉走后怎样》就体现了国人当时对妇女解放问题的空前的科学思维。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思维的角度加以探讨。

娜拉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名剧《傀儡家庭》（又译为《娜拉》《玩偶之家》《傀儡之家》等）中的女主角。从世俗的眼光看来，她是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然而当她醒悟到自己是丈夫的玩偶之后，向丈夫掷地有声地说：“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sup>[4]</sup>言罢毅然离家，飘然出走。该剧随着1918年《新青

年》的《易卜生专号》的广泛流布而广为人知，娜拉深度契合并引领了新文化运动之中个性觉醒的时代大潮，成为五四时期一般作家笔下所颂扬的妇女解放和个性自由的楷模，被当时广大青年奉为独立自主、婚姻自由的典范，甚至可谓“五四”一代新女性的精神导师。正是在此背景下，鲁迅以易卜生的终点为起点，也以当时绝大多数人认识该问题的终点为起点，发表这篇演讲专门讨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回望历史，以“娜拉”为源头和标志性人物，关于中国“娜拉”的文学和精神谱系早已建构并蔚为大观。尽管如此，这篇演讲辞置身该谱系之中，依然堪称见识超群、影响深远。写作是人的思维本质的必然体现<sup>[5]</sup>，支撑起这个经典名篇的，除了演讲技巧、布局谋篇、遣词造句等等因素之外，归根结底还在于其远胜时人、遥遥领先于同侪的科学思维，这凝聚着鲁迅心智的思想结晶时至今日仍然令人感服不已。

一、思维的独到性：见人之所见，更见人之所未见

当世人津津乐道于娜拉出走的时候，鲁迅思



想的锋芒已经指向更远更深处：娜拉走后怎样？演讲伊始，直接点题：“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整个演讲聚焦这个大问题，几乎处处体现了鲁迅迥异于时俗的独到见解。正如吴中杰评析的：“当人们正为娜拉的出走而激动，文艺界又出现了许多《娜拉》式的作品的时候，鲁迅却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这正是鲁迅的过人之处。他总是思考得比别人深一层，在别人看来是问题的终结处，他却提出了新问题。”<sup>[6]</sup>这种见人之所见、更见人之所未见的思维的独到性，使这次演讲具有了磁石般的吸引力，听众很自然地在他的指点和引领下多角度、多方位、大历史尺度地展开思考，去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

## 二、思维的深刻性：五度设问悬念迭起，刨根究底开掘深广

思维的深刻性，主要是从时间、逻辑的角度描述规定思维的理想品质。<sup>[7]</sup>如果说这篇演讲辞的标题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式路标，那么其中五次显性地设问就是遵循着时间和逻辑的顺序将其思想与艺术朝向深度广度开掘的一个又一个阶段性指路牌。

在简要介绍《娜拉》的作者、剧名和娜拉出走的缘由之后，鲁迅劈头一问：娜拉要怎样才不走？这一问，问得奇。按常理，正面扣题就得问“娜拉走后怎样”之类的问题。鲁迅的处理，看似离奇离题，实则与本题密切相关。傀儡意味着不自由，娜拉出走就是为了追求自由。如同书法上的逆锋起笔，这样就使得议论之笔更为圆润丰满。也许在鲁迅看来，如果要回答“娜拉走后怎样”，就有必要先回顾与此关联的“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后者的答案便是——给予她完全自由，或许就不走了——这有易卜生自己的《海的女人》（或译为《海上夫人》等）为证。这一方面为更好地理解“娜拉为何出走”，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参照，另一方面也为深入探讨“娜拉走后怎样”的本题，设置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意义背

景或者说价值框架，那就是不做傀儡，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开头第一问就非比寻常，思想的格局就显得宏阔、高远。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鲁迅再度设问：“走了以后怎样？”他从剧作者角度回应，介绍易卜生有关《傀儡家庭》创作的逸事趣闻，结果出人意料，完全没有人们想要的答案。如此回答，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因为易卜生毕竟是在搞文学创作而非进行社会研究或社会改革。

易卜生没有作出正面的回答，那么别人呢？于是，鲁迅第三次设问：“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从别人角度回应，一个英国人说是“堕落”，一个上海的文学家说是“回来”。鲁迅自己回答：“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然后重点阐释：“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因为，“娜拉走后怎样”本质上就是一个人生道路问题。鲁迅指出：“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紧接着就推出第四问——“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要想不走“回来”的老路和“堕落”的邪路，鲁迅说：“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这一问答，重点难点都在女性如何取得经济权，或者说女性如何去争取经济权的战斗。他提出：女性取得经济权“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战斗之外是平和的方法，即“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可以将财产平均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平等的经济权”。但这需要好的记性，否则照样再犯前人的错误。因而，鲁迅提倡如天津青皮无赖一样的韧性精神，不达目的不止。

在争取到经济权之后，一般人就满足了，认为目的达到了。鲁迅见识超凡之处，更见于第五次设问：“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回答：“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



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

当然，“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思想锋芒所向便指及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鲁迅在此演讲中就这样，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剥笋式地将思考不断推向更深处。

这五次设问和试答，每次设问都激起悬念，将思考引向深入；每次试答都不落俗套，别有洞天，令人如醍醐灌顶，似茅塞顿开。在思维的曲径之中，于“娜拉走后怎样”的大问题统摄之下，三番五次，打破砂锅问到底，最终给听众以深刻的启迪和丰富的教益。如此演讲一路听下来，脑子需要不断跟着同步运转，虽苦犹甜，不啻是一场思维的盛宴。

### 三、思维的超前性：明确预测宏大方向和路径，模糊处理具体方式和细节

鲁迅的思维是超前的，在这篇演讲辞中尤其明显。其超前性，体现在“以未来的尺度、可能的发展来引导、调整和规范现在，使现在更快、更好地逼近未来的目标”。换言之，超前思维“立足于现在，着眼于未来，并用未来量度和组织现在”。<sup>[8]</sup>鲁迅在这次演讲中强调：“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他在经历日本留学医学梦、文艺梦特别是辛亥革命一系列事件之后，对至善的“黄金世界”的怀疑乃至否定，使得鲁迅更加执着于现在——只有脚踏实地，把握住了每一个现在，才能赢得未来。1925年3月，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这些空想，也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

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sup>[9]</sup>鲁迅对于宗教家们的天堂和地狱，理想家们的“将来的黄金世界”的怀疑，并非否定将来和希望，而是执着于现在和现实，他对廉价的许诺不再轻信，更看重通过切实的奋斗以牢牢把握住现在，以“中间物”的信念夯实现、创造现在以逐步接近未来。

此次演讲，鲁迅思维的超前性，首先表现在对宏大方向和路径的明确预测。他说：“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眼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平等的势力。”，经济平等和经济自由是男女平等和个性自由的基础和前提。鲁迅对于人类获得自由解放的大方向和总路径的预测无疑是明确而坚定的，从“最要紧”，“在家应该”如何，“在社会应该”如何等用语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自信，全然没有同一篇演讲中其他地方所出现的诸如“或者”“也许”之类的措词留有余地的柔婉。近百年过去了，鲁迅的这一判断似乎并没有过时。显而易见，鲁迅所说“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实际上就在以最切近的未来量度、组织和构建现在，而不是去畅想并沉浸于遥不可及的“黄金世界”“极乐天堂”和至善的终极价值与意义。当时中国妇女要解放要自由，“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可谓击中肯綮，鲁迅透过娜拉出走的表象直击到了问题的本质。

鲁迅思维的超前性，还表现在对历史发展的具体方式和细节的模糊处理。超前思维对未来的发展趋势的预测，毕竟属于预测，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它不可能精准地预见到未来事件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必然有一定的模糊性。“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女性怎么取得男女平等的经济权？鲁迅坦言，其中的具体方式和道路，他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这



等好事不会从天而降，需要战斗，甚至是激烈的战斗，但是他始终反对无谓的牺牲。具体怎么战斗法、怎么激烈法，鲁迅并非算命先生或所谓的预言家，他只明确地提出，要有天津青皮无赖的精神，其要义就是韧性，即应当富有韧劲、锲而不舍地战斗，不达目的不罢休。

演讲到最后，鲁迅慨叹中国的改革太难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显然已经超出妇女解放的范畴。即便如此，鲁迅也将超前思维的明确性与模糊性融为一体：“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另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这是确定无疑的明确预测，是历史的血的教训和鲁迅亲身经历的惨痛经验所得出的预言性结论。它显示出中国改革往往是外力逼迫到了一定极值才会发生。往前看，清末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往后看新中国的改革开放、最近的军队改革，似乎都印证了鲁迅的预测无误。模糊的是：“但是从哪里来，怎么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尽管这样，这一超前的预测，仍然给人以警示，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

#### 四、思维的两面神性：三个维度互斥、双向、整合，立论充分而又辩证

“两面神思维”是美国精神病学家、行为科学家卢森堡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指的是：同时积极地构想出两个或更多并存的，同样起作用或同样正确的、相反的或对立的概念、思想或印象。由于形似于罗马神话中的门神面孔能同时朝向两个相反的视向而得名。<sup>[10]</sup>在表现违反逻辑或违反自然法则的情况下，这样两个或更多并存和同时起作用的相反物或对立面的表述，就产生了完整的概念和思想。作为五四先驱，鲁迅深受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股“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的影响；影响所及，既有思想精神层面的，又有深层心理结构和创作思维习惯层面的。<sup>[11]</sup>鲁迅的思维，经常呈现出两面神思维的特性。两面神思维具有互斥性、双向性、整合性等特点。互斥性指

其研究对象是相互排斥、对立的两种或多种现象、理论或观点，具体到社会科学领域可以是互斥的两种或多种意象、概念或词语等。双向性指其思维方向是双向视角，即同时关注相反的两个方向，它不同于反向思维（习惯性思维受阻时沿相反方向去探索）。整合性指其思维追求互斥者之间的统一，它不是简单的累积组合，而是一种新质的整合，是在不消融差别性和互补性的基础上达到一种整体效应。<sup>[12]</sup>在本次演讲中，鲁迅表现出显著的两面神思维特性。

##### （一）一与多

一与多是互斥的两个量。一个娜拉与多个（一百个、一千一万个……）娜拉给人带来的观感、冲击和影响，其差别显然判若云泥。清醒过人的鲁迅从互斥的两个极端铺展开他的双向思考：“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一个娜拉出走或许能够以新鲜、稀罕而获得同情帮助，一百个娜拉得到的同情会减少，一千一万个的话得到的只有厌恶了。无论上述情形怎样，“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可见，这都远离了娜拉出走的初衷——做一个不是傀儡的自由人。一与多就在这里实现了更高层级的整合。

##### （二）改革与不改革

改革与不改革自然分属互斥的两极。经济制度改革与否对妇女能否解放、解放到什么程度和水平，影响十分重大。鲁迅毫无疑问地思虑及此，因而在演讲辞中一句话独立成段如下：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简简单单一句话，综合上文，显露出演讲者



缜密的思维；更重要的是，看似平常的极简的过渡段，实际上暗含至少两层意思：一是在经济制度没有改革之前，上文所讲依然很重要，还是要做“目前的梦”，切切实实为妇女解放尽最大努力；二是不能坐等经济制度改革自己来到，需要“再想别的办法”。

只有改革与否则正反两方面都考虑周到了，对“娜拉走后怎样”这类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才可能充分、可行。

### （三）普通与特别

在本次演讲中，鲁迅式的曲折非常惹眼。在前述两次鲜明的两面神思维之后，紧接着又推进一层，豁然辟出新天地：“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普通”与“特别”，“普通人物”与“特别人物”，或者分别冠以“凡夫俗子”与“英雄豪杰”的世俗名词，这些当然互斥的特性或对象，在鲁迅口中笔下，又有一番双向的思维活动。此前演讲和行文，仅仅把“娜拉兰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这里，“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他一并指出：“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因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怎么办？“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作为普通人物也好，作为特别人物也罢，“娜拉”们出走之后的道路，各有自己的“走法”，但是都统一于不做傀儡、寻求自由理想，更整合在鲁迅双向思维后得出的结论里。那结论是：不管普通人物还是特别人物，“娜拉”在寻求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征途中，深沉韧性的战斗都是相对较好的策略。

两面神思维实质上是从对立之中去把握新的更高级的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它善于从差异中见到统一，或从相反的两极来构想统一，是一

种可贵的积极思维、高级的创造性思维。<sup>[13]</sup>鲁迅通过上述三个维度的两面神思维，从多个不同方向、角度和多种形式，进行了创造性的思索和探究，有效保证了其分析是充分的而非缺失的，有效保证了其思维是全面的而非片面的，有效保证了其结论是辩证、可靠的而非机械、失信的。

《娜拉走后怎样》这样一篇立足现实、指向未来的析理性问题演讲辞，无论议论之精辟、比喻之巧妙，还是布局谋篇之严谨、奇特，听众心理之调控、引导，都可圈可点。但是，比到最后比思维，这些无不植根于鲁迅堪称独步当时的科学思维。从思维的独到性、深刻性，到思维的超前性和两面神性，足以显示其见人识事、揆情析理的先人一步、高人一筹、深人一层。有人说，多疑是鲁迅世界得以诞生的标志，“它是鲁迅先生打量世界时，据以评判存在的一种否定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是以一种文学家的直感（而非理论家的系统逻辑）的形式显露出来”。<sup>[14]</sup>在这篇演讲辞中，鲁迅的多疑体现为多问，转化为多次、多重、多形式的剖析和周密的转换过渡。多疑也更容易养成思维的批判性，它构成了思维的意识 and 动力。前述思维的超前性、深刻性和两面神性，实际上就是思维的过程和方法，而思维的独到性便凝结为思维的结果，体现了思维的质量。正如郁达夫在《鲁迅的伟大》一文中所指出的：“如问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sup>[15]</sup>这与鲁迅学贯中西，而且早年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熏陶所养成的较宽知识视野和较强现代思维密不可分。“掌握并运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先进思维方法，是鲁迅取得创作成功的最根本的保障。”<sup>[16]</sup>《娜拉走后怎样》这篇至今传颂的经典演讲辞，之所以孤标傲世，最深层的原因也正在此。

本文系湖南省2012年度高校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鲁迅的演讲思想与艺术研究》（课题编



号：12C1041)和益阳市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2012年度立项课题《鲁迅演讲观和演讲艺术研究》(课题编号：2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5-171.
- [2]刘德强.演讲名篇鉴赏辞典(增补版)[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372.
- [3][10][11][12][16]刘为民.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291，287，290-291，287—289，293.
- [4]朱正，邵燕祥.重读鲁迅[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82-83.
- [5]张杰，萧映.写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
- [6]吴中杰.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02.

[7]马正平.高等写作思维训练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56.

[8]朱行能.写作思维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30.

[9]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0-21.

[13] unitsoft.两面神思维[EB/OL].(2015-08-29)[2016-02-13].<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mMdor7IXCECWdtf12MrkM76qf-ZQE8-zwcnV5NFs0654tQPrJy7hP7CWRROOt8zS78PX1MKc2aOQIkJm-q>.

[14]刘春勇.多疑鲁迅：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39.

[15]刘运峰.鲁迅先生纪念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211.

作者：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副教授。

(上接第62页)

的，他会像个婴儿一般在Mia的怀里哭泣。贾樟柯在张到乐与张晋生、张到乐和Mia的关系描写中，很明显地体现了一种“俄狄浦斯情结”。张到乐对父亲说要搬出去住，渴望自身的独立，而渴望独立也可意味着对父权的反抗，渴望对父亲的取代。而另一方面，他对Mia的依恋，实则将她当作了自己的母亲，在她身上找到了母性的回顾，并用非常直观的“性”的情节来表现“娶母”。他用张到乐的愤怒与对抗来表现“弑父”，同时又用年龄相差过多的爱情来表现“娶母”。贾樟柯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展示是比较直观的、赤裸的。

在《山河故人》中，贾樟柯不仅是宣告了向既有电影美学的回归，同时他也更多地开始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乃至华夏民族的精神内

核。在全球化被反复提及的今天，贾樟柯很显然想站在整个世界的角度上，用电影的话语来探寻中国人内心的困惑、精神的归属、身份的焦虑、人际间的关系、爱情的本质等等一系列命题。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国人的世界形象、经济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出现了新的困惑与焦虑。贾樟柯用想象未来的方式、从语言的使用巧妙切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成功勾勒出个体精神边缘化的世界图景。

注释：

[1]张会军、马玉峰《拥挤的世界 变化的中国 思考的贾樟柯——贾樟柯谈电影<世界>的创作与发行》[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作者：武汉大学艺术学系2012级博士生。